

论翻译与社会

H. K. 加尔博夫斯基 O. И. 科斯基科娃 著¹ 关秀娟 李 华 译²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 2.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任何翻译无论形式如何, 所在条件如何, 内容如何, 都是具有相应能力的人所完成的认知活动。译者转化信息, 并将其传递到新的交际空间。译者是能够解决跨语交际误解与冲突的“交际媒介”。几千年来, 人类社会带着各种目的使用译者的翻译结果, 评价其优劣, 赞扬喜欢的, 谴责难以接受的。现代科学多大程度上考虑了翻译的三位一体属性? 翻译活动的科学描述中, 哪些模式可以接受? 翻译的跨学科探索中翻译学与其他学科如何结合? 本文对现代翻译学的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关键词: 翻译活动与社会; 交际媒介; 译者认知活动; 翻译学; 跨学科; 翻译模式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翻译是人类的一种智能活动, 其活动主体译者具有内在的认知身份和外在的社会身份, 两种身份通过各种系统关系相互关联。就翻译内在认知本质而言, 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 包括接受一定来源(原文本)的信息、转化信息(理解和评价)、用另一符号系统编码、传递给另一交际空间。其中, 信息传递是译者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社会的直接沟通, 因为, 信息为社会所需。由此可见, 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

在当今“大数据”(Big data)时代, 译者是公共信息系统中产生新信息的一个关键环节。译者的活动使得全球公共信息系统得到了所谓的“跨语言大数据”的补充, 也就是某种文化现象的多语言呈现^①。

翻译的社会功能是“消除信息短缺”, 避免双语交际环境中因交际符号差异而无法相互理解的“交际不畅”。译者所起的作用是中介人, 即“交际媒介”, 其任务是解决造成相互误解和不解的交际冲突。如同所有的媒介, 译者居于交际双方之间, 具有获取更多信息的优势, 这就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相应的心理素质。翻译的社会属性使其受到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 包括译者(口译者和笔译者)在内的交际参与者的社会属性、各种翻译形式的社会意义、交际发生的环境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会影响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

翻译的认知本质与作为交际媒介的社会功能通过各种系统关系彼此关联。

翻译首先是人类的一种系统的智能活动, 诸多活动要素通过各种系统关系彼此关联。系统关系既决定了翻译过程的性质, 又决定了其结果——译文。译文, 包含内容和形式是在译者认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 这不仅是对原文的反应, 也是对一系列外部社会因素的反应, 如信息、技术、历史、经济、伦理、审美等, 这些因素彼此处于各种系统关联之中。各因素之

间持续的、系统的相互作用具有突发性，即“系统效应”，这是系统产生的特殊属性，亚系统及其分支不具有此类特点。这种相互作用影响翻译过程的主要环节——翻译策略。翻译策略的选择不能只依靠原文，不能脱离译者的内在认识与外在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

翻译策略旨在使译文、译文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明确的表达方式。翻译策略实现的前提是：确立翻译活动目标、判断翻译活动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可能性、探寻与评价可行方案、制定策略、实施策略，最后自我评判所实施的策略成功与否以及可能的后果。

2 译者的社会肖像：“交际媒介”

与以往相同，现有的社会观念中，译者常常被认为是通过提供“交际服务”来完成某种辅助活动的人。表面上看，完成这种社会职能不需要太多的智力投入，也不需要自己的想法和独立的决策能力。法国哲学家 A. Berman 论及翻译对现代文化空间的意义时指出，“翻译的地位是隐身的、次要的、被排斥的、辅助的”，甚至是“可疑的”（Berman 1984: 14），这也体现了译者的地位。

低估翻译活动社会作用的情况早在译者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上就已经形成。启蒙时代，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de 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1721 年）中描绘了一幅具有讽刺意味，且近乎滑稽的译者肖像：

一个人迎面走来，手抬到前额，对几何学家说：“很高兴碰到您，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我的《贺拉斯》刚刚出版了。”“怎么！”几何学家惊叹不已，“这书不是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出版了嘛！”那人说，“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出版了这位古代诗人的译本，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翻译。”“您说什么？”几何学家不依不饶，“就是说，您已经二十年没有思考了，先生？您为别人说话，他们替您思考？”“阁下！”这位学者说，“您不觉得，我使优秀作品更广为人知，为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吗？”“我并不完全这样认为：我像其他人一样尊重您所翻译的这些天才，但您自己却永远不会像他们一样，因为不管您翻译多少东西，都不会有人来翻译您的作品。译本终归就像铜币，它们可能会有金币一样的价值，甚至可以在民间广为流通，但总是分量不足、质量低劣。您说您想让这些著名的逝者在我们面前复活。我承认，您给了他们躯体，但您不能还原他们的生命，因为缺乏让他们起死回生的灵魂。您为什么不去做些简单的计算，来探寻美好的真理呢？每天都能做到。”这番小小的建议后，他们各自离开了，似乎对彼此都很不满意。（Монтескье 1721: 第 128 封信）

在几何学家看来，18 世纪的翻译家并不思考，只是重复别人的话，其劳动结果被认为是可怜的原作复制品。

这是很久以前创作的一幅关于非常不幸的译者的社会肖像，一代又一代传到了今天，没有多大变化。

这里的悖论显而易见：翻译活动始终为社会所需，翻译活动的产品也为社会广泛使用，但得不到良好的评价，总被轻视。

这一悖论本身可以成为社会学和翻译学的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用以解决反映翻译与社会多重关系的诸多问题。

造成这一悖论的原因之一是错误的社会意识：公众认为翻译活动比较简单。在谈到高校翻译培训时，R. Goffin 说得比较客观：

“翻译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它总是向业余爱好者敞开大门，这些人不断地扼杀这一职业。就在不久前，有人委托一位双语秘书做翻译，认为翻译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是还用现成方案的一种实践活动，只是好坏程度不同。”（Goffin 1971: 57）

实际上，即便翻译变成了一种大众化职业，社会对翻译活动的需求量依然很大。译员培训因此变得很受欢迎，译员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学接受专门、系统的大学教育。然而，迄今为止，大部分翻译任务仍然要委托给业余爱好者。

在当前信息和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当计算机从翻译辅助工具变为译者的竞争对手时，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失业”的普遍威胁下，在日渐完善的自动翻译系统的压力下，翻译职业是否很快就会消失？（Garbovskiy, Kostikova 2017: 366—368）当下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机器翻译取代业余爱好者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翻译职业可能重新从一种大众性的职业转变为擅长高超译法的精英活动。

翻译业余爱好者是指在行业中取得了译者身份、却不具有完备的专业翻译能力的人。

译者身份是 A. Berman 翻译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A. Berman 在论文《翻译批评：约翰·唐恩》中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提出，要进行翻译研究，要建立翻译批评的基础，必须先明确译者身份是什么：“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关注译者是方法论层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因为翻译阐释学的一项任务是洞见翻译主体。译文分析时，我们必须清楚：谁是译者？正如研究文学作品时，我们总是问：作者是谁？”（Berman 1995: 73）事实上，A. Berman 认为，两个问题，形式相同，背后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当我们谈及作者时，我们会关注他的生平以及能够揭示作品的心理动机和现实动机。即便结构分析者和内涵分析者试图抹杀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也不太可能会有人否认，如果不了解杜倍雷（Joachim du Bellay）、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或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生活，就很难理解他们的创作。“关于‘谁是译者这个问题’的探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Berman 1995: 73）

我们不得不赞同 A. Berman 的观点，除了少数例外，译者的传记和他的经历通常都与无关。确实，有谁注意到，是译者将荷马（Ομηρο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伏尔泰（Voltaire）、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及其他许多世界文学名著的作家引入俄罗斯文化的？

但是，研究者的兴趣或翻译批评的角度与译文读者的兴趣大不相同。对前者来说，译者身份不容忽视。译文分析或翻译批评时，他们一定会考虑“翻译实施者”的身份。

A. Berman 构建了一个模型用以揭示译者特点，当然，只是最接近译者特点。这位法国研究者认为，在这一独特的社会模型中应回答七个问题：

- 1) 译者对翻译语言和所接受的文化是什么态度（对他来说，翻译语言和所接受的文化是否为本民族的）？
- 2) 译者对翻译的态度：职业还是爱好？
- 3) 译者是否独立从事文学创作？
- 4) 译者可以用哪些语言翻译，熟练程度如何？
- 5) 译者是否只翻译一种体裁，是否只翻译同一个作者？
- 6) 所译作者和作品有哪些？
- 7) 译者的元文本实践有哪些，他是否发表了关于所译作品及其作者的评论，关于自己的翻译活动的评价，关于翻译的总体认识？（Гарбовский, Костикова 2009）

那么，阐释性研究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来探讨翻译是“陌生考验”（Berman 1984）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评价、解释译者在将不可理解的内容转化成可理解的内容、化解陌生现象时所做的选择？或者探讨克服“自己的”和“陌生的”的冲突的翻译策略？前者是追溯性的，属于翻译批评，后者是前瞻性的，归于翻译方法论。

必须指出的是，阐释“陌生的”构成了翻译策略的要素。如果我们再次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即翻译活动中用人工智能取代自然智能“译员”，那么译者阐释“陌生的”的问题就换了一个新视角：人工智能不存在“自己的”和“陌生的”。同样，翻译过程中，人工智能制定翻译策略的路径也会有别于人工翻译。人工智能将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提供最好的备选方案。但是，面对尚无多语种表达方式的新知识、新形式、新思想和新主张时，人工智能将如何表现？今天的机器已经能够写出“正确的”诗，“正确的”音乐作品。它很快就能翻译出“正确的”文本，消解所有个性的和“陌生的”的内容，因为机器对“陌生的”的概念是陌生的。

3 翻译认识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交往广泛开展，社会对跨语交际的需求量显著提高，翻译活动迅速发展，只有少量优秀译员拥有高超的翻译技能，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为应对翻译活动的社会需求，需进行快速、有效的翻译教育。然而，大众教育不能仅仅依靠从事教学工作的译员的经验技能，还必须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这些理论应该能够建构规约，也能建构表明翻译过程之间的联系且通过经验验证的通用模式。

理论需要应对时代的挑战，但与此同时翻译实践仍在快速发展。那么，当时的理论是怎样的呢？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的社会学方向和认知方向不如原文本语言对比分析领域，后者的目的是确认原文本和译文本的语义等效程度，至多扩展至修辞等效。俄罗斯翻译学奠基人 А.В. Фёдоров 强调：“由于翻译总是与语言有关，总是归于语言研究，因此，翻译更应该从语言角度进行研究，去探讨两种语言及修辞手段的关系”（Фёдоров 1953: 13）。研究者充分意识到，双语交际中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是不同的。这些因素至少归于三个方面：1）语言系统，2）客观现实及其反映，3）使用不同符号的交际参与者。但研究者以语言维度为中心。“翻译的客观过程首先是由语言特性产生的影响因素决定的，其余因素或多或少都是偶然性的。由此可见，翻译的基础是语言因素，翻译理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Комиссаров 2001: 241）

学术界甚至认为，翻译学以前是，也一直是比较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应用研究分支。一位杰出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 А.Д. Швейцер 在二十年后写道：“事实上，这是语言理论在特定语言活动——翻译中的应用。因此，可以将普通语言翻译学理论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领域，前提是后者不仅包括计算语言学（Computary Linguistics），而且还包括将语言理论应用于解决具体任务的任何领域”（Швейцер 1973: 16）。

翻译研究在语言学广泛而又有限的领域中得到了发展，语言学为翻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这一领域因其研究对象的特点而显得非常宽泛，因为语言学研究人类最重要的能力——用语言以不同方式表达思想。另一方面，就翻译而言，这一领域又是有限的，因为语言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对研究对象有自己片面且相当狭窄的认识。

语言学方法不仅基于语言系统的多样性，也基于每一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这种方法必然有存在的道理，因为即便人们不断尝试研究、描写不同语言对的关系，但是用另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重新对信息进行编码的原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20 世纪中叶的翻译研究者（如 Гак、Комиссаров、Рецкер、Фёдоров、Якобсон、Catford、Halliday、Nida 等）比较乐观地认为，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学及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和语言事实研究手段应该可以构成翻译学的核心领域，在他们看来，语言学能够回答翻译实践中产生的最紧迫、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的语言学理论及其语言事实转化分析法似乎最适合进行翻译活动研究。同样，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是理论语言学研究的真正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初首批研究翻译问题的法国语言学家 G. Mounin 指出：“翻译活动给现代语言学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我们同意语言的词汇、词法和句法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就必须承认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译者是存在的，他们创造了产品，我们很好地使用了这些产品。”（Mounin 1963: 8）因此，有必要分析，为什么语言学指出，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对另一种语言来说是行不通的，翻译过程中，人的头脑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忠实的翻译不会受到社会的质疑。

G. Mounin 精通俄语，是西方最早接触 Фёдоров 著作《翻译理论导论》的人之一，他对比了 Фёдоров 的翻译理论和 Эдмон Кари 的理论，前者支持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方法（Фёдоров 1953），后者是优秀的笔译和口译译员，否认语言分析对翻译研究的用处。对 Кари 来说，翻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过程（Mounin 1963: 14），它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G. Mounin 赞同 Фёдоров 的观点，批评了 Кари，认为 Кари 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但还不是一名优秀的语言学家。G. Mounin 指责 Кари 没有意识到，“除内部语言学外还有外部语言学（语言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语言社会学或社会语言学），甚至还有修辞学，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恰恰是译者一直在研究的问题”。G. Mounin 进一步指出，Кари 自己无意识地提出，“语言学因研究方法而超出边界的问题和领域仍然存在于广义的语言研究领域”（同上：16）。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毫无意义，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翻译学已发展进化，翻译研究中极端幼稚的语言学观念已排除。

在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的最初阶段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将科学探索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上，它可以整合不同学科研究翻译的研究对象，沿此路径可形成新的研究方向。为建立统一理论而对各学科研究对象进行整合，这就要求系统观，而研究对象的全面整合有利于建立一个新的学科。现代翻译学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将翻译活动的各个不同方面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综合（Гарбовский 2007, Гарбовский 2015, Salevsky & Müller 2011）。

4 翻译社会学

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并不仅仅指译者转换并传递到另一个语言交际空间的信息所体现的社会价值。

J. Heilbron 和 G. Sapiro 在为欧洲社会学中心进行翻译社会学研究时指出：“不久前对大量的翻译实践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所有研究都基于两个否定：否定文本及其转换的阐释分析，否定跨语转换的经济分析。”（Heilbron & Sapiro 2007: 1）

学者以 P. Bourdieu（2002）社会学研究理论为基础，试图从中发现适用于翻译研究的观点。他们从文化资产的角度来探讨翻译，也就是说，他们关注“文化资产国际流通的社会条件”（Heilbron & Sapiro 2007: 3）。对翻译的这种认识使研究者得以确定翻译社会学研究的本质：“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应关注文化资产实现跨国流通的众多条件，即文化国际流通空间的结构，影响国际流通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种类，发挥媒介功能的人，目的国接收文化价值的过程。”（同上：2）

可见，该研究思路体现了对翻译社会学的一定兴趣，因为它将在一个巨大的跨国文化空间中对文本转换条件进行多维分析，探讨翻译转换的社会、经济、政治制约因素，关注转换过程的参与者。

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思路体现的是对社会学研究的兴趣，而不是翻译学。翻译，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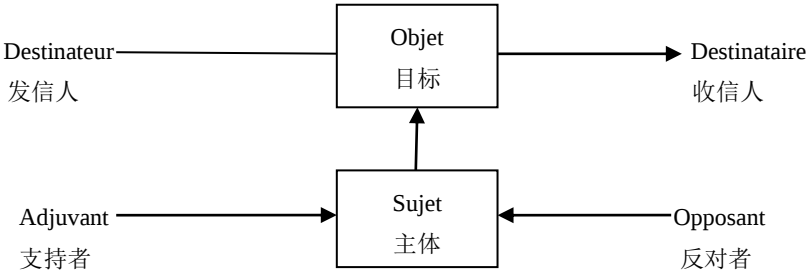
医学或其他任何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一样，可能成为科学、文学，甚至艺术等一系列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所涉及到的问题，即研究对象，总会有所不同。社会学对翻译研究有自己的兴趣点：就像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所说的那样，社会学倾向于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研究，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的活动”。

将翻译作为社会现象的研究范畴，有必要建立一种翻译社会情境模型，用以反映翻译行为的系统属性，体现翻译活动中的所有主体和客体，以及彼此的种种联系和外部条件。

5 翻译的社会模型

60 年代，法国语言学家 A.J. Greimas 建构了一个神话语义参与者模型，用来描写现实情境结构，分解现实情境组成部分。模型建构依据的是 В.Я. Пропп 所建立的语义模型（俄罗斯民间童话的形态学模型）（Пропп 1928）和 E. Souriau 的戏剧模型（Souriau 1950）。

Greimas 模型可以表述如下：行为主体（Sujet）服从其神圣的、历史的、社会的、职业角色的使命（Destinateur），按照一定的、具体的目标（Objet）行动，满足某一收信人（Destinataire）——一个人、群体、阶层、民族、人类的利益，依靠支持者（Adjuvant）的帮助，克服反抗者（Opposant）的抵抗：



(Greimas 1966: 180)

图 1 Greimas 建构的神话语义参与者模型

Greimas 认为该模型具有普遍意义，可应用于其他现实情境。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用该模型阐释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情境（Greimas 1966: 181）。作为一种变式，模型设有与现实情境参与者阶级划分相应的不同变体。

语义模型反映的是所谓的交际经验相似性，也就是说，“按照事情实际发生的顺序直接排列文字，将文本转化为现实情境”（Энквист 1988: 336）。这一观点表明，该模型不仅可以延用于现实情境，还可以推广到现实本身。因此，可以尝试将该模型应用于翻译活动情境。

翻译视角的参与者模型中，每个参与者与一种翻译情境元素（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相对应。即：

译者（主体），译文或译文文本（客体），翻译受众（受话人）、妨碍翻译活动的各种不利因素（干扰因素），促使翻译任务顺利完成的积极因素（辅助手段），委托、监督翻译，且对翻译结果进行评价的委托人（发起人）。

在传统的三人互动模式中，译者位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



图2 翻译视角的参与者模型

译者的任务是使读者贴近作者，将其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不了解的空间，或者使作者靠近读者，使作者可理解、可接受，成为读者的“自己人”。

社会学视角的参与者模型中，作者的位置并不确定，因为他不是直接出现在行为参与者社会关系系统中。行动者网络理论，即大家熟知的 ANT (Actor Network Theory)，是社会现象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该方法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 J. Law、J. Hassard (1999) 提出、M. Callon (2006)、M. Akrich、M. Callon、B. Latour (2006) 及其他研究者发展起来。这种研究方法不同于其他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似乎完全适用于翻译活动模式，因为它将事物、言语归入统一的行动者关系系统。

Greimas 于 1966 年提出的现实情境模型没有按照时间和空间划分情境。但是，M. Ballard 说得很对，“作为人和社会的活动，翻译在时空中发展。这两个参数是记录和活动的基础，也是决定行为或态度的框架” (Ballard 2009: 55)。这就是补充时间和空间参数作为状态元 (L. Tesnière 提出的术语，参见 Tesnière 1959) 来完善这一模型的原因。

添加时空情境后，Greimas 的参与者模型得到了扩展，翻译活动被模式化，成为一个围绕翻译活动主体——译者的系统模型，模型中译者通过各种系统关系与事物和文本相联系。

1) 状态元“空间”是一个统一的空间，它将原文文本产生的地点、译文接受者理解和接受的地点，以及现实情境的虚拟空间结合成一个统一的子系统。

2) 状态元“时间”是一个统一的时间，它将原文文本产生的时间、译文接受者理解和接受的时间，以及现实情境的虚拟时间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子系统。

3) 参与者“主体”指笔译/口译译员 (译者的个性、能力、学识、心理素质、道德与审美原则、心情与健康状况等)。

4) 参与者“客体”是原文本和译文本构成的二位一体的子系统，是文本转换子站。

5) 参与者“受话人”是读者、对话双方、受众、社会机构、翻译语言母语者群体。

6) 参与者“发起人”是指出版商、公司、社会机构、个人、翻译客户。

7) 参与者“辅助工具”是有利于译者活动的手段 (媒体、信息传媒技术、社会专业网络、交际技术工具等)、善意的批评。

8) 参与者“干扰因素”是不利因素 (恶意观察家、翻译的不便情况等)、恶意批评和书刊审查。

5.1 翻译主体

翻译社会模型反映了译者主体的一定状态，译者是跨语信息交际系统中翻译过程的核心要素。同时，其他参与者不同程度地影响翻译过程，通过自身对翻译过程和翻译客体的态度规约、指引主体的活动。翻译存在笔译和口译两种不同形式，翻译活动模型关涉翻译活动所有构成因素的社会功能。

正是译者，按照发起人的指引，踏入一个漫长的旅程，走过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欺骗性的世界，面对着不同语言、文化、社会、时代等的隐性对话。他这样做是为了他自己吗？如果译者是个业余爱好者，或者像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和其他古代先贤一样，是为了提高演讲技巧，为了在翻译语言中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还是为自己探索，那么回答是肯定的。但在社会翻译实践中这是比较罕见的。那种现象更多的是一些例外，而不是一种普通的的活动。译者更关注的是翻译方法论，而不是翻译的社会地位探讨。多数情况下，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翻译会或多或少地指向某个特定的受话人。

5.2 受话人

受话人是模型中的一个元素，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具有多样性。

口译实践中，借助译者的中介，交际双方可以直接参与到交际活动中。在模型中交际双方扮演发起人和受话人的角色：发起人监督译者，也会因为译者帮助自己与受话人沟通而奖励他。

当受话人不明确时，整个翻译活动的参与者所形成的三要素之间的社会联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是与口译不同的活动领域，其最终产品是在不同社会中再现的作品，其路径为“发起人——翻译活动参与者——受话人”。此外，社会实践中多样的翻译形式还包括信息中介（翻译专门信件、翻译某科学组织的科研成果）。

译者和受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呢？应该考虑受话人，还是相反，要忽略他呢？能把他与译者等同起来吗？翻译学的历史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十八世纪的译者喜欢迎合受众的观点。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 年）就是这种社会实践的良好例证。

“我不想给这本书写序，也不想为它呼吁读者：如果好，就会有人阅读；如果不好，就不在乎是否有读者。

我选了这些信来测试受众的口味：我的公文包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以后再呈现给大家。

但我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不被认出，我的名字一旦被披露，我就不再写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走路的步伐很坚韧，但一眼就能看出一瘸一拐。这部作品本身有很多缺点，为什么还要向批评者暴露我这个公众人物自身的缺点呢？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他们会说，“这本书不符合他的特点；他应该选更好的才对；这不是认真的人所为。”批评者永远不会错过发表此类言论的机会，因为这些话不必费脑筋就说得出来。

所以，我只履行译者的职责：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部作品适应我们的风俗习惯。”
（Монтескье 1721：序言）

然而，20 世纪 W. Benjamin 的理论却反对译者屈就公众的风俗和期望。该理论认为，翻译可以不符合受众的口味（参见 Benjamin 1923）。这样，翻译互动过程中受话人的功能就被缩减趋零。这种极具创意的观点肯定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主体，译者是自由的创作者，他向读者提供最终的文本，同样，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文本。译者的道德自由使他可以不考虑公众的偏好进行自由创作，形成某种创新风尚，带动其他译者也有所创新。受话人在这一翻译过程中作用很小，但比发起人大得多。与其说他是一位控制翻译过程的自然人，不如说是一个被某种翻译动力推动的人。

5.3 辅助设备与干扰因素

通常情况下，翻译被描述为一个由三要素组成的过程，根据这三要素，译者要么贴近原作，要么贴近翻译消费者。参与者模型建议取消这种对立，使译者成为活动的中心，并强调，要达到充分的翻译，就需要自由的活动。

译者不仅被那些鼓励他进行翻译或期待他翻译结果的人包围着，而且被那些对他的工作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人包围着，即上面参与者模型中提到的辅助工具和干扰因素。

辅助工具主要包括相对译者而言的外部情境因素，如语言和文化共相，也包括理解接受原文时观察现实情境的机会。原文的开放性有助于对其充分理解。辅助工具包括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翻译工具（包括口译记录系统）。翻译交际的成功有赖于社交媒体上的翻译论坛，以及翻译文本的校订和善意的批评。此外，这一范畴还包括译者的个性特征，以及翻译时的身心状况（语言和学科知识）、积极愿望（翻译动机）等。

干扰因素更加复杂，集合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首先，译者必须克服语言之间的不对称

和文化差异。原文的“封闭性”会造成释义干扰。干扰也可能表现为缺乏顺利完成翻译任务所需的辅助工具（例如，没有电脑或互联网笔译服务；同声传译箱里没有搭档，或与搭档心理上不协调）。顺利完成翻译任务的实际障碍也可能是主体本身，即译者个人，包括翻译活动准备不足、能力不足（语言能力、学科能力、跨文化能力）、翻译时的身心状况（健康状况不佳、紧张、抑郁等）。实际的干扰因素也可能是常数，即翻译活动中不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因此，翻译活动参与者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细微得多。

Greimas 社会学视角的翻译活动模型使人们从全新角度来探讨原文。整个文本本身可能属于第一类，也可能属于第二类，视其实质内容而定。有些文本最初就是为翻译而创作的，它们有标准的形式，甚至专门指向译语国家的文化，这些文本的翻译具有开放性。此类文本包括政治家对外国代表的演讲、国际组织的文件、多语种学术会议、技术文件，等等。

也有一些文本的作者认为其作品不会被翻译，因为他们为英语母语者创作文本，这些人能够理解和评价文本中难度不同的语言结构、修辞、文字游戏等。这些文本完全指向作者母语国家的文化，对译者来说难度很大，如文学作品翻译。对于译者、批评家、理论家来说，这种“封闭性”翻译文本是探讨翻译客体和翻译转换机制经久不衰的研究对象。

翻译文本的开放性或封闭性是一种社会现象，与人类交际目的相关。文本的这一特点要求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对翻译社会学进行深入研究，这种背景下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6 结语

译者的认知交际活动系统或可成为翻译学的研究对象。译者努力进入陌生语境，竭力挖掘共性，在不同中探寻相同，在相同中探寻不同。矛盾产生于翻译中“自己的”和“陌生的”的冲突，涉及语言、社会、心理、历史、民族性格等诸多方面。正是这些矛盾确定了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也只有通过综合各学科所积累的翻译知识才能够解释这种矛盾。

附注

1 如中国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lobal Ton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Ltd) 的国际项目，该公司是世界领先的跨语言大数据服务提供商之一。

参考文献

- [1] Гарбовский Н.К.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учебник. 2-е изд.[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
- [2] Гарбовский Н.К. Системолог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науки о переводе. Транс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сть и система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 [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22.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2015(1).
- [3] Гарбовский Н.К., Костикова О.И. Исповедь великого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или первый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трактат о переводе[J].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22.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2009(3).
- [4] 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 Слово о переводе[M].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3.
- [5] Комиссаров В.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M]. Москва: ЭТС, 2001.
- [6] Монтескье Ш.-Л. Персидские письма (1721)[M]. Пер. с фр. под ред. Е.А. Гунста. — URL: <http://lib.ru/INOOLD/MONTESK/persid.txt>
- [7] Пропп В.Я. Морфология сказки[M]. Ленинград: Academia, 1928.

- [8]Рецкер Я.И.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M].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4.
- [9]Фёдоров А.В.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M].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азных языках, 1953.
- [10]Швейцер А.Д. Перевод 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Газет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и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 [M]. Москва: Воениздат, 1973.
- [11]Энквист Н.Э. Стили как стратегия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я текста: Н.Э. Энквист[J].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88(4).
- [12]Якобсон Р. 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перевода[A]. Р. Якобсон.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C].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5.
- [13]Akrich M., Callon M., Latour B. (éds). 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 textes fondateurs[M]. Paris: Presses des Mines, 2006.
- [14]Ballard M. Qu'est-ce que la traductologie? Etudes réunies par Michel Ballard[M]. Arras: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2006.
- [15]Ballard M. L'espace-temps comme base traductologique[M]. Uluslararası diyalogun odağında bütün yönleriyle çeviri. din ofset matbaacılık san. Ltd. Sti Istanbul, 2009.
- [16]Benjamin W.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Charles Baudelaire, Tableaux Parisiens. Deutsche Übertragung mit einem Vorwort über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von Walter Benjamin, französisch und deutsch[M]. Heidelberg: Verlag von Richard Weißbach, 1923.
- [17]Berman A. L'épreuve de l'étranger[M]. Paris: Gallimard, 1984.
- [18]Berman A.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M]. Paris: Gallimard, 1995.
- [19]Bourdieu P.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dées[J].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12).
- [20]Callon M., Ferrary M. Les réseaux sociaux à l'aune de la théorie de l'acteur-réseau[J]. Sociologies pratiques, 2006(2).
- [21]Cary E. Comment faut-il traduire? [M].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1985.
- [22]Cary E. La traduction dans le monde moderne[M]. Genève: Librairie de l'Université Georg S.A, 1956.
- [23]Catford J.G.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24]Garbovskij N, Kostikova O. Dimension sociologique de l'activité traduisante[A]. Ch. Berner, T. Milliaressi (éds). La traduction: philosophie et tradition[C].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11.
- [25]Garbovskiy N., Kostikova O. Le profil du traducteur apprenti dans le climat cyberinformatique: formation – formateur – formé[J]. Lebende Sprachen, 2017(2).
- [26]Goffin R. Pour une formation universitaire «sui generis» du traducteur[J].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1971(1-2).
- [27]Greimas A.J. Sémantique structurale[M]. Paris: PUF, 1966.
- [28]Halliday M.A.K., McIntosh A., Stevens P.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M]. London: Longmans, 1964.
- [29]Heilbron J., Sapiro G. Pour une 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 Bilan et perspectives[A]. G. Sapiro (éd.). La traduction comme vecteur des échanges culturels internationaux: circulation des livres de littérature et de sciences sociales et évolution de la place de la France sur le marché mondial de l'édition de 1980 à 2004[C]. Paris: 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 2007.
- [30]Law J., Hassard J. (e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 [31]Mounin G.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M]. Paris: Gallimard, 1963.
- [32]Nida 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E.J. Brill, 1964.
- [33]Salevsky H., Müller I. Translation as Systemic Interaction. A New Perspective and a New Methodology[M]. Berlin: Frank & Timme, 2011.

[34]Souriau E. Les deux cent mille situations dramatiques[M]. Paris: Flammarion, 1950.

[35]Tesnière L.. Élé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M]. Paris: Klincksieck, 1959.

Translation and Society

Nikolai K. Garbovsky, Olga I. Kostikova¹, Guan Xiujuan & Li Hua (Translator's)²

(1.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2.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by Nikolai K. Garbovsky & Olga I. Kostikova, Guan Xiujuan(Translator) & Li Hua (Translator)

Abstract: Any translation, regardless of its form,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t is carried out or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original texts, is a cognitive activity of an individual that has relevant competencies. A translator generates information and introduces it into a new communicative space. S/he is a communicative mediator able to settle conflicts of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rising in the course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Throughout centuries, society has used the results of translators' work for many various purposes. It evaluates translator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praises them for what it is inclined to see as fine achievements and executes them for what it finds to be unacceptable.

To what extent does modern science take into account the threefold essence of translation? What models are acceptable in a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ow do translology methods correlate with those of other scientific disciplines in today's transdisciplinary knowledge about translation?

In the present article, the authors provide answers to these and some other questions posed in modern translology.

Key words: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society; communicative mediation; a translator's cognitive activity; translology; transdisciplinarity; translation model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汉)抗战翻译语境适应机制及其价值研究”(编号: 19BYY207); 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抗战时期俄苏文学汉译规范研究”(2020-KYYWF-0903); 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课题(外语专项)“抗战时期东北地区俄苏文学汉译研究”(WY2021003-A); 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俄苏儿童文学汉译语境适应机制研究”(编号: JC2019W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H. K. 加尔博夫斯基(1946—), 文学博士, 教授, 莫斯科国立大学高等翻译学院(系)主任; O. I. 科斯基科娃(1973—), 文学副博士, 副教授, 莫斯科国立大学高等翻译学院(系)副主任; 关秀娟(1975—),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学; 俄汉对比; 外语教育; 李华(1995—), 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 2021-04-12

[责任编辑: 信 娜]